

文史哲大系 56  
李紀祥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

文史哲大系 56  
李紀祥 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 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 / 李紀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民81

面；公分。--(文史哲大系；56)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069-7(平裝)

1. 儒家 - 中國 - 明(1368-1644) 2. 儒家  
- 中國 - 清(1644-1912)

127

81005016

(56) 文 史 哲 大 系

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

著

作者：李 紀 祥

發

行者：范 惠

出

版

者：

文 津

出 版

社

社

美 美

祥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電話：三六三五〇〇八・三六三六四六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8一二號

定價：新台幣三五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一 年十二月初版

ISBN 957-668-069-7

# 李著《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序 宋晞

孔子學說經孟子、荀子及歷代師儒賢哲之紹述，而發揚光大，蔚為中國思潮之主流，東方文化之正宗。凡為孔學學者，咸稱之曰儒家。凡為中國人，無人能自外於孔子思想德行之深刻影響。儒家思想以我人自身為天下國家之起點，天地萬物皆依我人自身，以人為中心，以人為基本，此種自強不息、發揚蹈厲之精神，誠令人有無限之感奮與激勵。

儒家一面講內聖，一面講外王，就是內備聖人之至德，而外具王者之風範，臻於內外咸修、術德兼備之人格典型，此乃中國傳統文化之特色。

李紀祥先生治中國思想史有年，繼《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之後，撰著《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博士論文，內容自「東林學術與道德經世」、「實學經世」、「清代漢學之成立」、「浙東史學及其系譜問題」，到「三代意識與清初儒學發展之古代取向」。系統分明，頗多新意。

明神宗萬歷年間，東林派人士融講學於政治，書院講學遂一變而為清議論政。儒學轉向，由教化而經世，由內聖而外王。東林派人士重視「朝政之是非」甚於「師儒之教化」，著者稱之為

「道德經世」。熹宗天啓、思宗崇禎兩朝，外則滿洲興起，內則寇亂千里，非有真正有用之實學，不足以力挽危瀾，則名之以「實學經世」。明遺民追思明亡原因，不再以濟救一時之實學為目標，轉向外王之追求，將儒學從「實學經世」提升至「外王經世」之思考層次，從顧炎武之「經學」，黃宗羲之「儒學」，費密之「弘道」與顏元之「復古」等來反映。按時間與空間之關係，並不固定，經常在變，因此文化也要日新又新，方能適應新環境與新時代之需要，孔子稱之為「時中」。曉峰師生前於若干論著中嘗詳闡其意。

著者於本書結論中提及：「儒學的範疇與儒家的性格，在『常』與『變』之間，在『聖』與『王』之間，究竟應如何掌握與界定，恐怕只有開放性與多元性，足予吾人以最好的回答與啓示了。」按開放與多元，實乃研究儒學發展之康莊大道。著者有見及此，令人激賞。

麗水宋 晴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於陽明山華岡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

## 提 要

北宋儒學初興，即已呈現多元發展，政治、經學、史學、義理、詞章，無不一新氣象。士大夫多以天下為己任，興學校、育人才、從事政治改革，其中尤以范仲淹、王安石為代表。逮慶曆改革、熙寧變法相繼失敗，儒學始轉向，心性義理之學超然拔起，成為此下儒學發展的主流，數百年間，由朱學到王學，歷經宋、元、明，儒學始終以內化格局的心性義理之學為主。

明代中葉以後，一方面心性之學發展到王艮、羅近溪泰州一脈，已達於頂點，愚夫愚婦，當下指點，即可豁悟良知，誠不讓禪門；另一方面，張居正歿後所遺留的閣部衝突問題，及其他許多經濟、社會問題，內外交熾，終於在新起的東林書院及其講學人士的言論中，開始表現出來，原來以教化為主的書院教育，也因為關心國事，議論政治，而使學術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方向，以經世為主。儒學內傾格局的轉變，便從明神宗萬曆年間開始，不復再以心性義理之學為主流。以儒學經世層面的變遷與發展為對象，來作研究與考察，是本文主要的目的，全文共分九章論述，自明代神宗萬曆年間開始，以迄於清代的考證學與浙東史學。

第一章「導論」：共分二節，第一節確定「經世」之範疇與論域，轉向後的儒學發展路向，

即以經世一詞表之。第二節介紹前人研究成果及本文行文之脈絡、論題、旨趣與限制。

第二章「東林學術與道德經世」：共分三節。主要在敘述以道德教化為主的理學，如何透過東林在學術上的「宗朱」及其政治行為上的「出位」、「清議」，開始作經世的轉向，而此一不徹底的轉向，正是一過渡時期。

第三章「實學經世」：共分四節。一種學風與思潮，有繼承、有發展，亦有反動，明末天啓、崇禎兩朝的學術，正足表達此種現象，在外虜內寇刺激下，以實用為主的經世之學，蓬勃而起，有繼承東林、有反理學、有復興古學，要皆以經世致用為主。

第四章「外王經世」（上）：分二節。以顧炎武與黃宗羲的生平與學術為主。本章與下章的處理方式，均以個人為主，以研究在明清易代之際，遺民如何面對時代、面對此一遽變，而表現出學術上的反思與重新建構。

第五章「外王經世」（下）：分二節。以費密與顏元的生平與學術為主。經由第四章與本章的研究，可以證明儒學並未解體，而且是遺民學術研究的重心，但其路向，顯然已以外王經世為主。

第六章「清代清學的成立」：分四節。第一節從經學復興述起，而以「體道」與「詁經」為兩種不同的方法進路。第二節則以顧炎武的《音學五書》為中心，以分析新經學方法如何建立。第三節則以顧炎武、黃宗羲及閻若璩、胡渭作一對比，以顯示清初經學家的兩種類型。第四節則

以乾嘉漢學的起源之解釋爲主，除考察前人諸說外，亦提出筆者的意見作爲補充。

第七章「浙東史學及其系譜問題」：分三節。第一節闡述史學與儒家外王思想之關係，並從章學誠「六經皆史」、「浙東學術」以及國史大業、鄉邦文獻兩點敘述浙東史學之特色與興盛之背景。第二節以黃宗羲爲中心，敘述黃氏史學之特色。第三節以「浙東史學系譜」與「宗黃」爲中心，以「歷史流傳」與「流傳歷史」特性之掌握，來分析史學系譜如何形成，並考證清初浙東學術的多元面貌。

第八章「三代意識與清初儒學發展的古代取向」：儒學史上的爭辯，如孟、荀之法先王、後王，陳亮與朱熹之王霸義利，不僅與價值判斷有關，而且更與歷史有關，本章即以「道史觀」與「勢史觀」來區別兩種脈絡。但這二種史觀有其相異，亦有其同，其同處即爲三代史觀，深處爲三代意識。清代儒學發展以經、史爲主流，但何以皆向古代集中，本章即以此而逼出問題，由三代意識而分析古代取向，此種原始情操有其烏托邦性格，但亦有「制作之原」的意義，本章共分三節，皆環繞上述數點而作分析。

第九章「結論」，綜合前述各章要點作一總結。並試申述師儒、彌輔、經師與儒家角色、性格之關係。

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

# 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

## 目次

宋序

提要

第一章導論

# 第一節 釋題：兼論一經世範疇與論域

## 第二節 本論文行文之脈絡、旨趣與限制

第二章 東林學術與道德經世

## 第一節 東林學派、東林書院、東林黨

## 第二節 東林在學術上——宗朱之意義

第三節 由道德向經世之轉向與難局：

一 珍貴世界的危機意識

## 二 由道德向經世的轉向——東林在明末思想史上的意義與位置

目次

### 第三章 實學經世

第一節 啓、禎時期的社集	五九
第二節 實用主義的學風	七〇
一、何謂「實學」	七〇
二、經世致用的學風	七四
第三節 反儒意識	八二
第四節 《經世八編》與《皇明經世文編》	九二
第四章 外王經世（上）：儒學之反思與重組	一三
第一節 經學即理學：顧炎武	一三
一、亭林一生三階段	一三
二、亭林對儒學之反思與重組：兼論「經學即理學」	一七
三、亭林儒學中的外王經世之動向	三一
第二節 儒者之學、經天緯地：黃宗羲	三九
一、梨洲一生之分期	一三九

二、明亡下的反思	一五〇
三、儒學之重組	一五五
<b>第五章 外王經世（下）：費密與顏元</b>	一八七
第一節 費密與王統論	一八七
一、費密生平與著述	一八七
二、費密的王統論	一九一
三、弼輔論	一九九
四、師儒論	二〇七
第二節 顏元：復古主義者	二二一
一、顏元生平述要	二二一
二、實用主義的「習」與復古的外王經世	二三六
<b>第六章 清代漢學的成立</b>	二四七
第一節 體道與詁經：一個經學方法進路的問題	二四七
第二節 《音學五書》	二五九

第三節 清初經學的兩種性格	二六七
第四節 有關漢學起源的解釋	二七四
<b>第七章 漢東史學及其系譜問題</b>	
第一節 從章學誠的〈浙東學術〉篇談起	二九一
第二節 黃宗義史學的特色	三〇二
第三節 浙東史學與浙東史學系譜	三二四
<b>第八章 三代意識與清初儒學發展的古代取向</b>	
第一節 三代史觀	三五一
第二節 「永康公案」中所反映的兩種儒家觀史態度：道史觀與勢史觀	三五七
第三節 黃金古代？制作之原——清初儒學發展的古代取向	三六七
<b>第九章 結論</b>	
附表	三七九

表一：經世範疇圖表.....五

表二：復社源流系統表.....六二

表三：明末經世致用學風表.....七五

表四：黃宗羲康熙元年（一六六二）以前學術活動表.....一四二

表五：大統相繼表.....一九五

表六：文武臣表.....一〇二

表七：邵學淵源圖（表）.....三四

## 書影

一、《陳太史八編類纂》，明天啓間原刊本.....一〇一

二、黃宗羲像贊手迹.....一四〇

## 參考書目.....三八九

# 第一章 導論

## 第一節 繹題：兼論「經世」範疇與論域

儒家所面對的終極關懷，表現在兩個不同的領域中，一是道德領域，一是政治領域，道德與政治在這裡的用法皆是廣義的。（註一）兩者並成為儒學中的兩域：內域與外域，其終極關懷各為：內聖與外王。

在道德領域中，又因其內向性與外向性，而亦有其內域與外域，係屬於儒學的第二層位。內聖、外王則為儒學的第一層位。道德領域中的內域，即是「修己之學」，（註二）也就是成德之學，在以內聖之學為主流的宋明理學中，因為以心、性為主體來發揮此一修己成德之學，所以牟宗三嘗將之定義為「心性成德之學」。（註三）但此一內聖之學，之所以又有外域，乃是因為儒學本就以世界為終極關懷，而非一己之個人。否則儒學即為「小乘」而非「大乘」。此點，無論在宋明理學中的程朱學派或陸王學派，皆是如此。（註四）

因此，宋明理學中的內域是「修己成德」，外域就是「教化」。筆者將理學中的「外域」稱之為「教化」，主要是在區別理學家承襲自先秦以來的「外王」思想，而此一種「教化」也不同於先秦的「禮樂教化」。我願先對這樣的看法作一說明。理學，一稱道學，或新儒學（Neo-Confucianism），其初不過為北宋新氣象、新學風下儒學之一支，即所謂的「伊洛之學」；同時尚有蜀學、朔學及王安石的新學等。一方面由於儒家在追求政治事功方面的慶曆改革、熙寧變法相繼失敗；另一方面，以二程（顥、頤）兄弟為主的伊洛之學，逐漸發展且南傳，至南宋朱熹時，遂壯大為「程朱之學」。（註五）並進而在理宗朝取得朝廷的公開承認。（註六）元代皇慶二年（西元一三一三）更透過政府的正式詔令，成功地成為科舉的官學。（註七）。

在理學家中的外王思想，雖然也有發展，並承襲了先秦儒家的「德治主義」性格，加以《大學》為主的一套架構，便仍然指向「治、平」為終極關懷；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的《大學衍義》也正是在這種觀念下的一部重要著作。（註八）但是，畢竟以「君」為核心的外王之學，已無任儒者作主而展開的餘地，更何況是在北宋以降君權逐漸提高的背景之下。

整個說來，儒學縱然在外王方面遭到扼阻，內聖之學亦已儘可能偏離政治領域而獨立發展其思想；但是，套用佛家的用語，儒學即使在內聖之學領域中，也仍然非「小乘」，決非以成己便為了一事。理學家們終於在內聖之學中開拓了它的新領域，依舊為人而落實在這個世界中，這便是「師儒式」的「教化」。原始的外王，是「君王式」的「治平」，即使是「禮樂教化」，如《漢

書》〈藝文志〉所言：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所謂王道至治者，也依然須環繞一個「君、王」的位格。是故漢代時猶稱孔子爲「素王」，但至唐代時，孔子已被尊爲不具王格的「先聖」，孔子在稱謂尊號上逐漸被剝落「王」格而凸顯「聖」格的過程，也正與儒學發展的內化與內傾歷程相應。（註九）

唐、五代以來，儒家所面臨思想上的大敵，來自釋、道二氏；而釋、道的本質是宗教的、思想的、文化的，這與先秦時代的各家之中心關懷是政治的有所不同。因此，一方面儒家必須加強自己「內域」的一面，此點直歷數百年而未已，也因此造成了宋明理學內化的傾向與格局。另一方面，儒家關懷天下的性格，也必須顯示，儒學的「外域」，已轉向一個新的層域——即與「教化」有關的世界中來。換言之，理學家實質上的「外域」，已不再是「原外王」，看待其外域的眼光，必須從實質上加以調整。理學家的新外域，其終極關懷仍是「天下」，本質上也仍然是「唯德論」，只是，他們的方式已與先秦儒家有所不同。先秦是「王天下」，理學家則是「教化天下」；理學家所強調的位格，也不再是「君」、是「王」，而是「師」、是「儒」。

因此，「師儒」模式的「教化」，才是理學在實質上的「外域」。但理學家們顯然沒有這樣自覺地區分，當他們提及外王時，外王仍然扣緊「王」格。朱熹之上宋孝宗（一一六三）—一八九）諸封事、真德秀之著《大學衍義》，均是原外王意識的表現。但理學家在對「大我」——「人